

本地化戰略的參考方針

孟敬賢*

在公共行政培訓中心開始活動之際召開關於本地化問題的一次研討會，這清楚地表明該論題對過渡時期諸項任務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優先性。

如果1987年的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確實把“澳門問題”從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問題轉化成學者們記載和反思的歷史事實，那麼，隨着該聯合聲明的簽署，本地化問題也已不再是一個和相對公正的純理論責任相關的問題，而是轉化成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分配行政權力的一個政治問題。

同樣重要的是：隨着聯合聲明的簽署，本地化這個公共事務管理上的效率問題，變成了一項法律及政治上的責任，一項以聯合聲明為依據、受其監護並在聯合聲明中載有作為其指南的強制性規定的法律政治責任。

鑒此，本地化將可以理解為澳門葡萄牙政府的優先目標；同樣也可以理解為在倉促行事和深思熟慮的戰略之間不可有絲毫搖擺不定，儘管過渡時期很短而很多位置和職務又有待於本地居民去填補。

事實上，必須確定一些基本規則的定義，沒有它，無論什麼樣的本地化政策都將缺乏可信性和可行性，墮為不折不扣的政治蠱惑，成為失望和不信任的根源，進而導致社會的不滿和不安定。

當這些基本規則的定義已經確定，或近期內可以確定，將使政府能夠在1990年實施一項能保證行政機器在過渡期結束時繼續運行的本地化政策。

* 行政暨司法政務司

中文成爲官方語言及其逐步推廣；學歷的承認以及同等學歷的確定；確定進入公職所需要的葡語和漢語的水平；對在海外招募人員作出規定，修訂公職法律制度，重整職程結構；改善並擴大對新人的培訓和進一步培訓在職人員的能力，所有這些均是行之有效的方案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否則，任何努力都將是徒勞的

今年年底前實現這些條件，即具備了實施一項本地化戰略必不可少的前提，某種分散的方式在政府各部門不斷發展和協調各項工作並加強招募和培訓新人員的主動性。

本地化是一項複雜的任務，其起點在歷史上已明顯推後，是在穩定和有信心的情況下開始這項工作的，是與推動過渡時期進程的所有人的支持有關的。

公務員本地化還是“一國兩制”原則得以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條件，而這個原則又是未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行政架構的大樑。

事實上，只有堅信多元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效力的政府官員才能保證這種社會制度在其領土上在一國內同社會主義制度並存，不以他人的信條而改變自己的行動，但要尊重歷史演進給他們造成的差異和命運。

在澳門居民中招募培訓這些官員係由本地葡萄牙政府負責，他們是本地*生活方式*的當事者與表達者，而聯合聲明保證這種生活方式至少延續到下世紀中葉。

在招募和培訓新人員的過程中以及任何空缺的填補中，我們不對不同思想、理論和民族加以歧視。但我們也不會漠視澳門大部分居民是華人的事實，絕不允許看到在新政體機制中缺乏使行政機器與本地區人口現實相適應的資格、經驗和能力的情況。

還必須指出的是，政府仍然認爲，使用雙語是保證過渡時期之後本地行政機器的連續性和完整性，以及保證真正維持澳門*生活方式*的要素。雙語的推廣不僅包括學習葡語，也包括學習掌握漢語，儘管在政府方面根據擔任的職務的性質所作的要求不盡相同。

當然，不能企望在用十年時間實現四個世紀沒有做到的事。亦不能絕對阻止接納不會講葡語的公務員。但要求所有可利用的手段、規定和技術，盡可能地擴大本地使用雙語的人數，否則，難以想象本地法律如何能保持不變，難以想象澳門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如何行使其職能；難以想象當澳門不再是葡萄牙共和國管理的領土時，“（……）在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如何、爲誰和被誰使用葡語。

這並不是不合時宜的殖民主義，也不是有持無恐的文化擴張計劃。如果我們要保存澳門文化遺產的企求正是正當的話；如果這個企求不僅正當而且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聲明中明確承諾的話，那麼，有問題的主要是保留一種法律政治體制，而這種法律政治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語使用的連續性，無論其相對數字在現在或將來是多麼的有限。

這法律政治體制取決於雙語的使用。也取決於適應新時期需要的本地法律的現代化。毫無疑問，它也取決於能維持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的權利、自由和安全的司法機構。它還取決於本地化，沒有本地化，澳門就不會享有聯合聲明為之確認的高度自治，在子孫後代的心目中，它不過是珠江三角洲上一個朦朧的港口而已。

本研討會現在閉幕了。我僅想通過這個講話，代表政府把有助於澄清本地化戰略的參考方針向大家轉達。

討論大門常開：大家可繼續發表意見。

